

新闻纸书系001 出品·策划/金光印

编著/周翔平等
评注/王芙蓉等
摄影/金光印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INA YOUTH PRESS

0063*

看他们

北京100个
外来贫困
农民家庭

大棚蔬菜■报摊■报亭■报纸■板车■冰箱■草房■车库■大料■电饼铛■电动三轮车■电话亭■豆浆机■二
衣■旧式彩电■垃圾箱■蓝边碗■炉子■煤气罐■煤气灶■煤渣■门脸房■摩的■木板■木头■棚子■平房■破户
■双床■水泵■水泥■弹簧秤■土坯房■土灶■碗柜■卧铺车■五叶客车■小柜子■小汽车■烟囱■硬板纸■
■保洁■奔丧■查税■超载■抄摊子■出嫁■辍学■打牌■打人■打水漂■打游击■掉包■躲债■罚钱■反抗■分家■改建■
■挽留■睡大街■没收■追■取暖■找茬■争气■探访■失踪■离婚■投靠■选举■征地■抢劫■献血■巡逻■请客■赎■
■保姆■帮工■厨师■出摊■带孩子■蹬三轮■打场■呆着■打野摊■打地摊■打短工■耕地■拉砖头■临时工■理发■美容美发■卖菠萝■卖早点■卖
■开店■开车■开荒■看门■跑长途■私了■扫大街■筛砂子■输血■弹棉花■脱粒■挖河■掘井工■瓦匠■挖煤■修路■洗头■
■马路■赚钱■装修■装卸工■种地■田超■白内障■博爱医院残疾中心■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病历■出血■CT■打点■
■洗碗工■要饭■

■钢筋■军
■子■石板■四
■挨饿■扒房子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看看他们：北京 100 个外来贫困农民家庭 / 周拥平等编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ISBN 7-5006-5731-5

I. 看... II. 周... III. 农民—家庭—社会调查—北京市 IV. D4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1826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84035821

邮购部电话：(010) 64032266-8261

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1/16 24.75 印张 19 插页 365 千字

200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0 册

定价：33.00 元

本图书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 63939233

献词

谨以此书

献给全国数千万“流动青少年”

愿他们在“流动”中励志求知，健康成长，创业成才

献给全国亿万进城务工、

为城市建设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农民朋友

愿他们以辛勤的劳动获得财富和尊严，

在他乡平安快乐地工作和生活

献给为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和

流动人口子女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而

奔走、支持、奉献的

新闻工作者、法律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学术工作者

以及政府部门、社会团体、民间机构和各界志士

共青团中央
书记处常务书记



出品说明

关于内容、结构和体例

本书的主体内容由“北京市外来人口贫困问题研究”的访谈记录和研究报告构成，该项研究课题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青少年发展与政策研究所承担，由周拥平负责课题的具体设计和实施。陈涛博士为课题做了很多前期准备工作，包括查阅、梳理有关文献，提出研究的理念和思路等。实地调查从2002年3月中旬开始，到4月上旬初步结束，之后又对部分家庭进行了多次回访。这项研究的调查方式是现场深度访谈，访问员除了与被访者进行长时间的谈话，还在访谈过程中对受访者家庭的生活细节进行观察，并结合访谈记录和现场观察撰写个案分析。个案分析按统一的格式撰写，包括“贫困状况”、“贫困原因”、“被访者对贫困的感受、希望、要求”、“对其前景的分析判断”等方面内容，个案分析没有选入本书，周拥平根据100个访谈记录并参考这些个案分析撰写的研究报告，作为一个附录收入书中。

我们对访谈记录进行了极为节制的删节，并统一用“×××口述实录”作为标题，口述实录排列顺序在成书时做了一定的调整。在部分口述实录中，访问人员穿插了一些观察记录的内容，只要这些内容与受访者的陈述不重复，就基本予以保留，在正文中用仿宋体予以区分。

在每一个口述实录的首页附上了最初调查登记表影印件，并制作了受访者家庭原籍位置示意图，如果受访者和户主的老家不在同一个省，则按照户主老家所在地制作。

第二部分《我要读书》是另行策划的内容。

本书采取了评注方式，评注的内容仅代表评注者的观点。评注的内容用等线体标注。

关于访问员

本书中的“访问员”在原访谈记录中是“记录员”，他们忠实记录了受访者的陈述，而访谈之外的部分附加的许多文字展现了他们的洞察力和情怀，表达了他们的思考和关爱。由于篇幅的限制，那些闪亮的文字绝大部分都没有呈现在书中，我们想把更多的思考空间留给读者。对于这些访问员来说，他们记录工作比他们在记录中说话更加有功德，他们所做的工作，许多应该做的人都没有做到。他们承担这次社会调查任务的时候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三年级的学生，现在已经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社会效力了。如果本书有一些价值，他们的劳动是首先要肯定的。他们的名字分别标署在各自承担的访问篇目下面，但我们还是有必要先熟悉一下他们。本书中出现的24位访问员是：杨清、蓝涛、张春意、高汝峰、张铮、谢启文、戴志妍、何连连、姚健、闵佳燕、李天民、贺菲菲、

北京市外来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第一、二研究小组成员调查期间在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贺菲菲、杨清、蓝涛、张春意、张铮、戴志妍、何连连、李天明、高汝峰、谢启文。第三、四研究小组没有留下工作照。[摄影 周拥平]



倪浩、李蓬、杨晶、郑军、许文龙、任致辉、陈刚、寇浩宁、周依敏、谭晓燕、戴捷和白玛卓嘎。

关于“絮叨”和“雷同”

在本书的100个口述实录中，“絮叨”算得上一个比较普遍的语言特征，前面说我们在编辑过程中进行了非常节制的删节，不包括改变他们的语言特性。他们说话是有些絮叨，有些跳跃。有时候是一个问题反复讲，有时候是一个问题没讲完就讲别的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在编辑时予以了宽容，我们不能要求他们说话像知识分子那样有条不紊。请读者稍微耐心一些，就当作是他们当着你的面说话好了，只要耐心听，他们表述的意思还是相当清晰的。当然，对于他们说话中的一些明显的语病，我们还是进行了适当的校正。

陈述者所陈述的内容从表面上看有相似的成分，但这纯粹是表象。组成这些农民生活的元素都是柴米油盐吃穿住行等基本元素，但谁又能说哪两家的生活是完全一致的呢？可以负责任地说完全不同。借这些相同的生活元素呈现不同的生活状态，正是本书的使命之一。

关于年份表述

每一个口述者在陈述他们的故事时，都涉及到年份，按照《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年份是不能简写的，但考虑到这些口述者陈述的实际语境，我们对他们的年份表述在转化为书面语言的时候予以了特别的宽容，比如77年、93年、98年等等。凡是简写的年份均指19××年。对涉及到2000以后的年份，又统一采用标准表述；口述实录以外的其他文字，涉及到年份的，一律按标准表述。

关于“你大哥”、“你大姐”

“你大哥”、“你大姐”是本书部分口述实录中出现的特别称谓，指称口述者的爱人，受访者用这种称谓表示和访问人员之间的亲密无间。

关于摄影

本书图片作品除署名外，拍摄者均为金光印。其他摄影者和图片提供者包括摄影家鄂青、平面设计师兼摄影师严丽娜、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易本耀以及本书编著者周拥平等。

关于感谢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先生为本书撰写献辞，他们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第一副院长褚平先生从课题的调查研究到本书的出版均给予了具体的支持和帮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先生、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华先生以及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红星打工子弟学校五（二）班谢秦雅风小朋友为本书倾情作序。

《中国信息报》记者王麦玲为本书的出版做出了重要贡献，03 工舍平面设计工作室的同志们为本书的设计制作放弃了春节休息以及与家人的团聚，北京电视台记者任保国先生为本书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资料，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沙龙为本书摄影做了大量联络工作，陕西籍来京务工者张立权先生、山西籍来京务工者柏星山先生、安徽籍来京务工者汪从胜先生、北京羊坊店街道保洁中心环卫工人金秀芬女士等为本书的摄影提供了热心的帮助。

这些人，这些事，都值得我们铭记于心。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部长

韩俊序

棋子·边缘人·产业工人

我曾经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民比喻作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从体制、政策到各项管理制度上，都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农民被剥夺了自由流动的权利，丧失了流动的活性。在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中，由于城乡间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只能滞留在土地上，农民实际上被排除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之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阻隔城乡联系的各种制度障碍受到了巨大冲击，农民逐渐恢复了流动的活性，跨地区流动日趋活跃。1978~1998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从不足200万人增加到6500万人；1998年以后，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数量更加膨胀；到2003年，实际外出就业数量已达9900万人。就全国而言，外出就业农民约占农村劳动力的13%左右，在中西部一些地、县，则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0~30%。近几年，在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连续减少的背景下，全国平均的农民纯收入之所以还能保持增长，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在增长。近年来工资性收入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在80%左右。目前，非农就业收入已经占到农民收入的近一半，工资性收入已经占到农民收入三分之一。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农业户口人员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已经高达46.5%，第二产业中农业户

口从业者已经占到了57.59%。从上面罗列的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已成为当前农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出务工就业的农民已经成为对中国城乡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不应被忽视的社会群体。

外出农民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尽管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在城市居住和工作了很多年,但仍然很难融入到城市中,实际上仍然处在城市的边缘。我记得1994年敬一丹女士在中央电视台主持“一丹话题”时,曾约我专门就“边缘人向我们提出了什么”作了一个专访。当时,我们谈到希望外出农民能尽快丢掉“边缘人”这顶帽子。已经快十年的时间了,外出农民的规模越来越大,但对他们的一些不公平的、甚至是歧视性的政策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记得2000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一个很著名的社会学教授到北京访问,我们在北京饭店见面。她那天正好看到《北京日报》上有一版刊登了北京市劳动局的规定,规定有很多个行业限制或禁止雇用农民工,她对此很不理解,认为这种歧视在全世界都是很罕见的。实际上在国内这种做法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我们曾在北京市做过调查,一个外来民工每年办一次暂住证要交180元钱,后来又搞了一个就业证,每年办一次要交180元钱,还有婚育证、健康证等。北京市对每个农民工一年的收费一共是485元。又比如,深圳2001年共办理暂住证343万个,收费金额约10亿元。这笔资金虽是通过财政专户收上来的,但相当一部分又按一定比例拨付给了公安、劳动、计生等部门用于暂住人口管理队伍的经费开支。有关部门在收取了管理费用之后并没有为民工提供任何劳动就业培训,没有为民工提供任何劳动就业信息,也没有对他们的劳动权利提供任何的法律保护。从实际情况看,大多演变成以管理之名,行收费之实。管理就是收费,有些收费甚至就是用来充实本单位的小金库。这种以就业证卡管理为中心的就业制度,对外出就业农民带有明显的歧视性,损害了进城农民平等的就业权利,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也没有真正起到引导农民有序流动的作用。

1982年国务院发布过一个《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主要是针对沿街乞讨流浪的人员,目的是要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权。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由于农民大量外出,民政部和公安部联合对这个条例做出了修改,修改后的政策中对遣返人员的范围做了一个比较宽泛的界定,包括了“三无人员”,即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证件、没有固定住所的人。根据这一条例,各大城市都制定了自己的《收容遣返条例》。比如没有证件,过去界定为没有身份证,许多城市的收容遣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针对没有暂住证、没有就业证的人员。北京市1999年一年就收容149359人,约占外来流动人口的5%,仅11月26日一天就收容了

4167人。这其中相当多是“三证”不全的外来就业人员。再如,上海市在80年代年均收容总量不超过1万人,1988年收容遣送1万人,约占外来人口总量的1%。进入90年代,随着外来就业人员较快增加及收容政策的变化,收容遣送人数增加更快,1993年达到4万人,1996年为6万人,1997年超过10万人,占外来人口的比例升至3.6%。收容数量成倍增加,并不是因流浪乞讨人员增多,而是收容范围扩大到“三证”不全的外来民工所造成的。大的收容遣送活动一般是在过年过节和重大活动的前夕。全国喜庆和传统节日,成了打工者担惊受怕和倒霉的日子。粗暴遣返农民工是对进城农民最基本公民权利的粗暴践踏。

随着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农村一些儿童伴随外出就业的父母流入了城镇。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有流动儿童近2000万。中国儿童中心最近完成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流动儿童受教育状况不及全国儿童的平均水平,失学率竟高达9.3%。一直未上学者占6.85%,失学者占2.45%。从8岁到14岁,流动儿童未上学比例由0.8%增长到15.4%,中途辍学的现象比较突出。调查发现,在失学的12~14岁流动儿童中,有超过60%的人已经开始工作。这不仅违反了义务教育法,还严重侵犯了儿童的基本权益。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使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群体结构发生了改变,传统以本地常住户籍人口儿童为对象的义务教育安排受到挑战。进城务工农民的第二代已经成长起来,子女教育是个大问题。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都有民工子女的非正规学校,事实上已经成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但往往处于无人管的状态。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今后城市劳动力的素质和城市化进程,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以上只是罗列了进城农民合法权益最容易受到侵害的几个主要方面。目前,政府对进城农民的管理政策还存在需要进一步改革的地方,如:一些城市对外来民工的管理,仍是与市民差别对待,行政控制、政府部门审批发证、人为限制的计划式管理,与市场经济平等与自由竞争的精神相背离。进城民工与原有城市居民身份、地位及就业、迁移、社会保障、享受公共服务等权利不平等。一些城市把进城农民工多视为危害治安的群体,一整顿秩序就把矛头指向农民工,而对他们的合法权利却疏于保护,管制有余,服务不足,更未重视农民工融于当地社会等。

我们高兴地看到,90年代以后,适应农村人口大规模跨地区流动的要求,国家关于农民流动和就业的政策也逐渐发生变化,其基本点是从限制农民流动,逐步转向承认流动、接受流动、鼓励流动。特别是最近两年,国家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政策发生了更积极的变化,在降低农民外出就业门槛,保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中央明确提出,对进城农民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在孙志刚事件后,国务院在

最短的时间里出台了废止收容遣返制度的政策，温家宝总理亲自为农民追讨工资，中央明确流入地政府要解决好外来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取消不该收的“借读费”等；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200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城市政府要切实把对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及其他服务和管理经费，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提出要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依法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各项权益。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这些政策都是深受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欢迎的。这些政策的出台，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理念。

《看看他们》是一本真实反映进城农民生存状况的书。每个人读了这100进城农民的故事，心灵都会受到震撼。希望在我们国家，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进城农民、理解进城农民、关心进城农民、关爱进城农民。期待着在我们国家各种阻碍城乡联系的体制壁垒能尽快消除，农民能充分享受到自由进城和自由迁移的权利。因为加快城镇化的发展，逐步减少农民，这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成败的关键。



全国政协委员
CCTV 著名节目主持人

敬一丹序

打开一扇门

翻开这本书，就像看到了很多人。不同的面孔，不同的口音，不同的故事，在人流涌动世事变幻的背景上，显得漂浮不定、若隐若现。

我第一次在电视上谈到民工，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春节后的一天，我乘地铁上班，车厢里挤进一群农民模样的人，他们风尘仆仆，扛着行李卷，怯生生地聚在一起，一看就是出门找活的民工。这情景触动了我，在当天的《经济半小时》节目里，我谈到了民工现象。不久，有一位专家找到我，说，这个话题很必要，但你谈得还不够深入。我就势请这位专家和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谈了几次。从流动人口产生的原因到发展趋势，从经济到社会，从农村到城市……那以后，我再看到民工时，就不仅是感性的触动了，总会联想到很多。

在媒体工作，我可以看，可以说。职业，使我有更多的了解他们的机会，有条件传播他们的声音——

看到农民工受歧视，我说：人都是一样的；

看到图书大厦建筑工地的民工被隔在城市文明之外，我说：民工需要精神文化生活；

看到出来打工的多是青壮年，我说：留在村里的女人很苦；

看到进城农民的孩子在长大，我说：上学是孩子们的权利，是阳光下天经地义的事。

看到农民工人身没保障，我说：把人当人。

我的声音也很轻微，但比起缺少甚至没有表达渠道的农民工，我毕竟是能发出声音的，放大弱者的声音，这让我欣慰。

民工、打工仔、打工妹、农民工、外来农民……十几年来，这个特殊的群体被不同的称谓叫着，被不同的眼光看着，然而，不可遏制地生长着。如今，数以亿计的人口在城乡之间流动着，成为当今中国特有的经济社会现象。谁想了解中国的国情吗？从走近一个农民工，走近一个外来农民家庭开始了解吧！他们一边连着乡村，一边连着城市；一边连着苦难，一边连着希望；一边连着昨天，一边连着明天。他们身上承载的东西是沉重的，也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的。

这本书，就为走近他们，看见他们，倾听他们，打开了一扇门。



陆建华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CCTV《央视论坛》特约评论员

从他们身上可以领悟到 多得多的东西

《看看他们》一书，把我们放置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上，来倾听百多位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的主观倾诉。

正是这样特殊的角色交错，让书中的每一个故事背后的每一个人的境遇、体验和所思所想，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冲击波，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总在被提示一个问题：他们如果依然在自己故土上生活的话，还会有这样让人难以判明其苦乐的种种境遇？这是一个答案不言自明的问题，却在引出另一系列问题：是哪一种力量在促使他们背井离乡同时又牵扯着他们的心绪和情感？而在那些陌生的城市中，是哪一种力量在拉动他们进入同时又在顽强地抵制他们？

读到这本《看看他们》，让我想起前些年出版的影响甚巨的另一本书：《黄河边的中国》，那是一个学者在乡村实地考察的心得，是依旧生活在一片乡土上的农民，而《看看他们》展示的却是一群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留在乡土上的

农民所遇到的生活难题和发展窘境，每一种场景、每一次经历、每一个故事确实振聋发聩；而进入流动状态的农民所面临的难题和窘境，如这本书所展示的，应该用比振聋发聩更振聋发聩的什么词来形容。在绝对意义上，《黄河边的中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在乡村中的乡村，而《看看他们》则使我们面对一个个在城市中的乡村，而这个乡村正是近亿进城农民肩负来的。和乡村中的乡村相比，城市中的乡村事实上属于漂浮在城市的汪洋大海之中，仿佛一叶孤零零的小舟。那些进城农民一开始就栖身于这样的小舟上，他们要生存要壮大，惟一的选择，就是学会游泳，跳下大海。但是，谁教给他们游泳的本领呢？我们在这本书中所看到的，正是一群群努力想学会游泳的学习者，平心而论，他们付出的成本太高了，学成者寥寥，吃尽苦头者众众。不是他们不努力学习，而是他们学习的机会太少。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形成一种共识：中国农村目前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上的种种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前数十年期间国家和社会发展战略选择上的特定局限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概念不仅仅是学术用词，也是政治文献和政策文件上的用词。这个结构描述了城市的发展以农村、农民和农业的落后为代价的严酷局面。也就是说，现在近亿进城农民在生活上的难题和工作上的窘境以及学习能力上的某种缺陷，在本源上正是城市“造成”的。我称之为城市对乡村欠下的“原罪”，是为第一宗罪。

在《看看他们》这本书里，我看到了第二宗罪。城市正在以剥夺农村、农民和农业而形成的既定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优势，来剥夺进城农民，限制进城农民。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局呢？温和的学者会以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来解释城市对进城农民的排斥，但他们最常用的一个学术语汇就是“冲突”。的确是冲突，一种搅进了农民的希望、血汗、困苦、欲求的全方位的冲突。在进城农民学习城市生活和发展的知识、技能、心态和其他必备的要素问题上，这样的冲突就极其惨烈。用书中的一位受访者的话来说，“一出门就看得出来，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冲突更惨烈的冲突吗？前些年，一些体面的大城市政府纷纷取消实施多年的关于限制外来农民工用工的各种规定，但为自己辩解说，当初的限制性规定是完全必要的，而对那些在这些规定面前打工梦碎的进城农民毫无愧疚之意。这些年，一些地方政府在建立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而又不为进城农民接受相应的培训提供必要的帮助，最后以这样的制度把他们无情地排斥在职业门槛之外。而在面对一些城市里用工单位肆意践踏进城农民劳动权利（如克扣工资、超时加班、劳动环境恶劣等）的严峻问题时，一些政府部门居然贬斥农民工的合理申诉，名义却是改善投资环境，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在进城农民难有定居之所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挥起清理三无人员的大棒，对他们的栖身之地进行拉网式扫荡，

美其名曰：治理整顿城市发展环境。就这样，城市巨人时时在以“合理的”缘由来对进城农民犯下第二宗罪。

这就是真实的城市中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冲突。《看看他们》这本书真实地展示：在这样的冲突中，进城农民与城市力量之间的悬殊差距。

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农民依靠的是个体的力量，而城市赖以体制的力量；农民依靠的是求生存求活路的本能，而城市赖以难以辨别其善恶的理性；农民依靠的是对未来的模糊的希冀，而城市赖以坚固的现实篱樊。两相冲突，就注定这本书的叙述者们经历的坎坷、心灵的震荡和行为的失措，但是他们正是以这种方式来顽强地与乡村中的乡村来告别，进入城市中的乡村，进而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开拓自己的发展空间。《看看他们》就是要看看他们在与乡村中的乡村中所身陷的困苦和刚刚进入城市中的乡村时所身陷的困苦；就是要看看他们如何不屈于这些困苦，依靠本能、情绪和不太熟练的生活技能来告别困苦。进城农民是一个群体，而城市却是一个汇集了各类群体的庞然大物，它们之间的冲突就构成了如这本书里所描绘的充满着悲壮与希望、失败与辉煌、挣扎与奋进的图画。每个人在读到这本书的每一个进城农民及其家庭的故事时，都可能会发出一声唏嘘，会产生一丝同情，会激起一种对不公的批判，但不仅仅是这些。在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每个人的生命历程总是整个社会变化历程的一种折射，但是因为每个人所处的地位和状态的不同，这种折射的效应也是有所不同的。

读了这本书，我强烈地意识到，我们可以在一位出国留学生身上、或在一位国有企业经理身上、或在一位民营企业家里、或在一位中学生身上、或在一位知识分子身上、或在一位公务员身上，能够看到所折射出来的时代变化与社会转型的印记，但是，我更愿意在一位进城农民——就是这本书所记载的——身上，去寻找那种印记，而我相信，能够从这种印记中领悟到多得多的东西。

谢秦雅风序



北京市海淀区红星打工子弟学校五(二)班学生

我向温爷爷表个态

记得去年教师节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敬爱的温爷爷到玉泉路外来子弟小学视察，还在黑板上写了“同在蓝天下”几个大字，我的心情就非常激动，知道他是那么关心我们，我真想拉着他的手说说我们的心里话。

我的家乡在陕西省镇坪县，那里是山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爸爸、妈妈就不在我和爷爷奶奶身边了。听奶奶说，他们去了离我们家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是北京，去那里打工可以挣很多钱，回家盖房子，给我买很多好吃的，还可以让我长大后上很好的学校。从那时我就想，北京一定是个很大很美的地方，一个有爸爸有妈妈的地方。

我四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回家过年，我非常高兴。当他们说又要回北京的时候，我哭闹着不肯让他们离开，爸爸妈妈只好带我一起到北京。

北京真的很大，马路很平很宽，晚上还亮着很多灯，像白天一样。我的家在一个有很多小房子的院子里，屋里放着一张床，一个桌子和一个炉子，我和爸爸妈妈都住在一个屋里。妈妈总是说：“脱鞋上床玩去。”在床上我也会玩得很开心，因为有爸爸有妈妈在身边。

一个夏天我在门口玩，看到很多小朋友都背着书包上学了，我就跑回家，